

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共富效应

——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

王科斌 侯建翔 张志彬 侯永康

摘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加大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本文构建了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框架，结合 2008—2016 年县域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全国税收调查的匹配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均衡性转移支付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提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不仅显著降低了工资折价率，还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终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此外，由于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提升，企业会减少劳动力雇用。基于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 and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效应不会因行业或企业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企业劳动力雇用下降的现象在各类行业和企业中均普遍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若政府对企业实施财政补贴，均衡性转移支付可以持续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同时有效抑制企业劳动力雇用下降的趋势，从而实现“促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兼顾“稳就业”的政策效果。本文从均衡性转移支付视角研究，能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均衡性转移支付 劳动收入份额 收入分配 共同富裕 财政体制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但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 2008 年达到 0.491 的峰值后，才呈现波动下降态势，截至 2020 年仍高达 0.468^①。在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的背景下，大量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均发现，劳动收

〔资助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政府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和风险防范研究”（编号：24ZDA04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研究”（编号：23AZD055）。

〔作者信息〕 王科斌，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侯建翔（通讯作者），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279790607@qq.com；张志彬，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侯永康，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①资料来源：《〈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232.html。

入份额偏低，是加剧居民收入不平等、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蔡昉和王美艳，2014；张松林，2015；李实和朱梦冰，2022；万广华等，2022）。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已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亟须回应的重要课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①。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均衡性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展开讨论^②。关于该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关系到对转移支付制度收入分配效应的评价，有助于廓清均衡性转移支付这一财政再分配政策究竟能否从功能性收入分配层面推进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这对设计更加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核心工具之一，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居民就业增收的基础。揭示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将直接回应如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提高居民劳动报酬、促进收入合理分配、扩大内需的关键问题，对当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就业和居民增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微观企业的生产要素收益结构，因而，剖析企业劳动成果的内部分配，有助于系统理解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与形成。目前，已有众多研究从税收政策与社会保障等财政分配视角，针对如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展开了大量讨论，但是并未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就税收政策而言，Li et al.（2021）发现企业所得税减税改革导致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杜鹏程等（2021）指出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促进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再从社会保障方面来看，张同斌等（2023）通过对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效果的评估发现，社会保障征管力度的强化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不过，张子尧等（2023）同样以该法的实施为政策背景展开研究，却发现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反而有所下降。上述迥异的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现有财政分配政策调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效果存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探索其他财政再分配工具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推进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深化运用均衡性转移支付等财政再分配制度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工具选择（周强，2021；范燕丽和丛树海，2024；伏润民等，2024；周强等，2024）。

县政府是中央对下实施均衡性转移支付的主要落实层级（伏润民等，2012）。因此，要稳健且深入地评估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成效，县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切入点。然而，囿于县域数据可得性，既有文献对均衡性转移支付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效应的讨论尚不够深入，相关启示的挖掘也较为有限。为此，本文整理了中国县域层面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数据，力图弥补这一研究的不足，系统厘清均衡性转移支付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效应。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②1995—2019年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宏观事实关联，具体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一。

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在如下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其一,在研究视角上,聚焦均衡性转移支付,拓展财政再分配政策调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系列研究。以往针对财政再分配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税收(Li et al., 2021; 杜鹏程等, 2021)或社会保障(张同斌等, 2023; 张子尧等, 2023)方面,鲜有来自财政转移支付维度的专门研究。唐盟(2023)虽剖析了1999—2007年地市级专项转移支付与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但其研究重心在于解释这一时期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为何下降,不仅对于2007年以来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新事实和机理缺乏关注(刘亚琳等, 2022; 郭凯明, 2025; 张俊森等, 2025),也没有讨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中的劳动力雇用问题。因此,深刻认识财政转移支付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还需要新证据。本文的拓展在于:第一,聚焦财政转移支付中最为重要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利用2008—2016年县域层面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全国税收调查匹配数据进行研究。第二,讨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问题,并分析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中的劳动力雇用问题。

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剖析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初次分配效应,拓展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分配效应的相关研究。既有大量文献从再分配效应视角,提供了财政转移支付影响规模性收入分配的深刻洞见(韩一多和付文林, 2019; 周强等, 2024)。但财政转移支付是否具备初次分配效应,现有文献并未充分回答,经验证据尤为匮乏。本文把均衡性转移支付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从要素间功能性收入角度,呈现均衡性转移支付调节初次分配效应的微观经验证据,以期为中央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一个新的选择工具。

其三,在研究数据上,推进2009年以来县域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效应的经验研究。囿于数据可得性,已有研究一般采用截至2009年的《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马光荣和孟源祎, 2022; 方红生等, 2024)。本文利用2008—2016年县域层面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数据展开分析,为理解该时期县域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 制度背景

均衡性转移支付旨在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统一公式基于财政收支客观因素分配财力补助。长期以来,均衡性转移支付是中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历史使命。尽管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的名称经历了从“过渡期转移支付”到“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再到“均衡性转移支付”的三次转变,但结合均衡性转移支付不同历史时期的分配管理办法,可以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民生的本质始终未变。回顾从无到有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其整体改革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

^①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特征事实未在此详细报告,具体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二。

1. 第一阶段（1995—2001 年）：过渡期转移支付时期。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执行新的税收分享标准，中央财政收入规模和收入占比都获得了显著提高。但在改革初期，部分地区仍存在财政困难，地方政府机构的基本运转乏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不足。为了调节纵向及横向政府间财力差距，1995 年，中央决定在不触动地方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提取本级有限增收的部分财政资金，以影响标准财政收支差额的因素法测算公式作为主要分配依据，对财政困难地区进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分配，以提高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保障能力。自此，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正式建立。在该时期，过渡期转移支付确保了地方政府机构的基本运转，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2. 第二阶段（2002—2008 年）：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时期。2002 年，中央进一步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中央本级财政收入规模大幅提升。改革同时规定，中央因改革新增的全部财政收入需要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规范的方法”用作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既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奠定了基础，也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对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从 2002 年起，中央把一般性转移支付修订为财力性转移支付，将过渡期转移支付改名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在《过渡期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并且逐步引入公共支出成本差异系数，进一步完善标准财政收支差额的因素法测算公式，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的对下资金分配。另外，本轮改革也提出，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的短期目标是保障地方政府机构基本运转，长期目的是扭转地区间财力差距，逐步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该时期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的政策效果来看，在短期内，维系了地方政府机构运转；在中长期内，有力缩小了地区间财力差距，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奠定了基础。

3. 第三阶段（2009 年至今）：均衡性转移支付时期。随着分税制的成熟稳定，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的政策效果凸显，2009 年，中央决定将“财力性转移支付”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原有财力性转移支付子类项目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正式定名为“均衡性转移支付”，随后形成了《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与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时期相比，基于均衡性转移支付因素法的测算公式，动态适时地考虑了更为全面的影响因素，细化了标准收支差额，也引入了“增幅控制调整以及奖励资金”等系数。此外，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也被明确界定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的来说，均衡性转移支付正式定名至今，其重要意义集中体现为：调节纵向多级政府间财力不平衡，缩小横向同级政府间财力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进程，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升民生福利水平。均衡性转移支付为以共同富裕为本质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和现代财政治理，确立了财力保障和制度基石。

（二）基本机理

1. 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权上移引致了地方自有财力的匮乏，加上在“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干部晋升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也表现出明显的生产性支出

偏向。例如，地方政府青睐于将为数不多的本级财力投向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而这导致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但是，均衡性转移支付可以重塑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其优化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这一作用的逻辑机理在于：一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和政策目标就是激励地方政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及其均等化，而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均衡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高以及供给规模扩大（缪小林和张蓉，2022）。另一方面，获得均衡性转移支付可以直接提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缓解财力短缺问题，从而有助于地方政府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加大投入（Aronsson and Blomquist, 2008）。因此，均衡性转移支付可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2. 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上，均衡性转移支付下的高水平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可以通过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首先，当政府供给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较为完备时，劳动力所面临的失业威胁较低（谢申祥等，2019），就业保护公共服务（如劳动合同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解聘，这可能会限制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行为（Autor et al., 2007）。而资本—劳动替代比例下降，将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譬如，陈凌庆等（2025）就证实了资本—劳动替代比例提高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其次，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的工作技能培训等服务内容，有助于优化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提升劳动技能水平（Sala and Silva, 2013），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姚加权等，2024），进而会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何小钢等，2023）。最后，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求职培训等服务内容，可以提升劳动力的劳资谈判技能，增强工资议价能力，减少工资折价现象（柏培文和杨志才，2019）。而长期以来，劳动力议价能力的高低，一直被视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与否的关键因素（Blanchard and Giavazz, 2003）。

综上所述，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能够以促进资本—劳动替代比例下降、提高劳动生产率与降低工资折价率等路径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三）模型分析

接下来，本文参考魏下海等（2013）的理论模型，并结合 Yeh et al.（2022）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研究中所强调的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势力，构建一个产品市场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存在买方垄断势力的理论分析框架，阐释均衡性转移支付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理论命题。

1. 生产函数。企业使用资本与劳动两种要素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常替代弹性形式：

$$Y = \left[\alpha (K)^{\frac{\sigma-1}{\sigma}} + (1-\alpha)(BL)^{\frac{\sigma-1}{\sigma}} \right]^{\frac{\sigma}{\sigma-1}} \quad (1)$$

（1）式中： Y 是企业产值； K 是资本要素； L 是劳动要素； σ 是资本与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满足 $\sigma > 0$ ； α 是资本及劳动要素的份额参数，满足 $\alpha \in (0,1)$ ； B 是劳动增强型生产率，满足 $B > 0$ ，类似劳动技能水平提升使每单位的劳动可以产生更多的产出。

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结构，即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劳动力市场存在买方垄断势力，企业拥有一定议价权，企业面临向上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企业支付给劳动力的工资为：

$$W = \frac{\partial Y}{\partial L} \cdot \frac{1}{\nu}, \quad \nu > 1 \quad (2)$$

(2) 式中： W 是工资； ν 是工资折价率，表示劳动力从其边际产出中获得的份额， ν 越大劳动工资越低；其他符号含义与 (1) 式相同。

2. 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选择最优的资本与劳动进行利润最大化决策，企业利润函数为：

$$\Pi = Y - rK - WL \quad (3)$$

(3) 式中： Π 是企业利润； r 是资本要素价格；其他符号含义与 (1) 式或 (2) 式相同。

企业最优要素投入的一阶条件为：

$$\begin{cases} \frac{\partial Y}{\partial K} = r \\ \frac{\partial Y}{\partial L} = \nu W \end{cases} \quad (4)$$

3.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定义为：

$$LS = \frac{WL}{Y} = \frac{1}{\nu} \cdot \frac{\partial Y}{\partial L} \cdot \frac{L}{Y} \quad (5)$$

将 (5) 式化简可得：

$$LS = \frac{1}{\nu} \cdot \frac{1}{1 + \left(\frac{\alpha}{1-\alpha} \right) \left(\frac{K}{BL} \right)^{\frac{\sigma-1}{\sigma}}} \quad (6)$$

(6) 式中： LS 是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K/L 是资本—劳动替代比例；其他符号含义与 (1) 式或 (2) 式相同。由 (6) 式可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主要由要素替代弹性，工资折价率、劳动增强型生产率、资本—劳动替代比例等因素决定。

4. 比较静态分析。根据前文基本机理可知，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能够以促进资本—劳动替代比例下降、提高劳动生产率与降低工资折价率等路径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而，结合 (6) 式来看，其具体影响的数理表现可以如下：促进资本—劳动替代比例下降，即 K/L 减少；提高劳动生产率，即 B 增加；降低工资折价率，即 ν 降低。

此外，根据 (6) 式还可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也受到要素替代弹性影响。因此，还需要结合不同的要素替代弹性变化情况来展开细致分析（魏下海等，2013）。

①情况 1： $\sigma > 1$ （资本与劳动替代）。根据 (6) 式， LS 关于 K/L 、 B 、 ν 的偏导数分别如下所示：

$$\frac{\partial LS}{\partial (K/L)} = -\frac{1}{\nu} \cdot \frac{1}{\left(1 + \frac{\alpha}{1-\alpha} \left(\frac{K}{BL}\right)^{\frac{\sigma-1}{\sigma}}\right)^2} \cdot \frac{\alpha}{1-\alpha} \cdot \frac{\sigma-1}{\sigma} \cdot \left(\frac{K}{BL}\right)^{\frac{\sigma-1}{\sigma}-1} \cdot \frac{1}{B} < 0 \quad (7)$$

$$\frac{\partial LS}{\partial B} = \frac{1}{\nu} \cdot \frac{\frac{\alpha}{1-\alpha} \cdot \frac{\sigma-1}{\sigma} \left(\frac{K}{BL}\right)^{\frac{\sigma-1}{\sigma}-1} \cdot \frac{K}{B^2 L}}{\left(1 + \frac{\alpha}{1-\alpha} \left(\frac{K}{BL}\right)^{\frac{\sigma-1}{\sigma}}\right)^2} > 0 \quad (8)$$

$$\frac{\partial LS}{\partial \nu} = -\frac{1}{\nu^2} \cdot \frac{1}{1 + \frac{\alpha}{1-\alpha} \left(\frac{K}{BL}\right)^{\frac{\sigma-1}{\sigma}}} < 0 \quad (9)$$

(7) 式中: $\frac{\partial LS}{\partial (K/L)} < 0$, 即 K/L 下降时 LS 会增长; (8) 式中, $\frac{\partial LS}{\partial B} > 0$, 即 B 增加时 LS

将增长; (9) 式中, $\frac{\partial LS}{\partial \nu} < 0$, 即 ν 下降时 LS 将增长。综上所述, 当资本与劳动替代时, 均衡性转移支付可以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

②情况 2: $\sigma=1$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此时, $LS = \frac{1-\alpha}{\nu}$, 将其分别关于 K/L 、 B 、 ν 求偏导数, 可得 $\frac{\partial LS}{\partial (K/L)}=0$ 、 $\frac{\partial LS}{\partial B}=0$ 、 $\frac{\partial LS}{\partial \nu} = -\frac{1-\alpha}{\nu^2} < 0$ 。由此可知, LS 与 K/L 以及 B 无关, 但是会随着 ν 的降低而下降。因此, 当资本与劳动要素替代弹性为 1 时, 均衡性转移支付会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③情况 3: $\sigma < 1$ (资本与劳动互补)。根据 (6) 式, LS 关于 K/L 、 B 、 ν 的偏导数分别如下所示:

$$\frac{\partial LS}{\partial (K/L)} = -\frac{1}{\nu} \cdot \frac{1}{\left(1 + \frac{\alpha}{1-\alpha} \left(\frac{K}{BL}\right)^{\frac{\sigma-1}{\sigma}}\right)^2} \cdot \frac{\alpha}{1-\alpha} \cdot \frac{\sigma-1}{\sigma} \cdot \left(\frac{K}{BL}\right)^{\frac{\sigma-1}{\sigma}-1} \cdot \frac{1}{B} > 0 \quad (10)$$

$$\frac{\partial LS}{\partial B} = \frac{1}{\nu} \cdot \frac{\frac{\alpha}{1-\alpha} \cdot \frac{\sigma-1}{\sigma} \left(\frac{K}{BL}\right)^{\frac{\sigma-1}{\sigma}-1} \cdot \frac{K}{B^2 L}}{\left(1 + \frac{\alpha}{1-\alpha} \left(\frac{K}{BL}\right)^{\frac{\sigma-1}{\sigma}}\right)^2} < 0 \quad (11)$$

$$\frac{\partial LS}{\partial v} = -\frac{1}{v^2} \cdot \frac{1}{1 + \frac{\alpha}{1-\alpha} \left(\frac{K}{BL} \right)^{\frac{\sigma-1}{\sigma}}} < 0 \quad (12)$$

(10) 式 $\frac{\partial LS}{\partial (K/L)} > 0$, 即 K/L 下降时 LS 会下降; (11) 式 $\frac{\partial LS}{\partial B} < 0$, 即 B 增加 LS 会下降;

(12) 式 $\frac{\partial LS}{\partial v} < 0$, 即 v 下降会促使 LS 提高。由此来看, 当资本与劳动互补时: 一方面, 工资折价率会产生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效应; 另一方面, 劳动增强型生产率与资本—劳动替代比例会引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效应。因此, 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并非单向, 其最终结果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权衡。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理论命题。

命题 1: 当资本与劳动替代 ($\sigma > 1$) 时, 均衡性转移支付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命题 2: 当资本与劳动要素替代弹性为 1 ($\sigma = 1$) 时, 均衡性转移支付会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命题 3a: 当资本与劳动互补 ($0 < \sigma < 1$) 时, 若工资折价率导致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效应占主导, 则均衡性转移支付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命题 3b: 当资本与劳动互补 ($0 < \sigma < 1$) 时, 若劳动增强型生产率与资本—劳动替代比例导致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效应占主导, 则均衡性转移支付会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三、实证设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使用了三套数据。第一, 2008—2016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每年抽取全国各地大约 70 万家大、中、小型企业。使用该数据库有如下优势: 相较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而言, 其可使用年份相对较新且企业级统计指标更丰富; 而较上市公司数据库而言, 其涵盖的企业规模更多维, 因而对宏观经济的代表性更强。本文基于该数据库构造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以及企业层面的其他相关变量。

第二, 2008—2016 年财政转移支付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门调研的纸质档以及电子档资料, 作者团队将这些数据资料进行了电子化处理后形成了数据库。具体而言, 该数据库在时间跨度上包括 2008—2016 年的连续数据^①。在主要变量方面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总额、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总额、

^①本文采用 2008—2016 年为样本期的原因还有: 该时期恰逢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 2010 年前后“触底反弹”的转折期, 同时也是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迅速扩张的关键阶段。因此, 该时期为考察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效应提供了理想的时间窗口。此外, 尽管 2016 年以后均衡性转移支付政策不断优化, 但其基本制度框架和资金分配机制保持稳定。因此, 基于 2008—2016 年数据得出的分析结论, 仍具现实意义与政策参考价值。

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下的均衡性转移支付项目等。表1报告了数据库历年的县（市、区）匹配样本量在全国和不同地区的占比情况。表1显示，样本覆盖率在此期间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81%逐步下降至2016年的63%，其中，2015—2016年下降较为明显。这一变化主要受到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财政数据收集程度的阶段性变化，部分县（市、区）在2015年之后的数据难以完整获取，导致匹配失败；二是行政区划调整，部分样本在研究期内出现合并、撤销或重新设立等情况，影响了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尽管样本覆盖率在后期有所下降，但其总体分布仍具备广泛代表性，涵盖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大多数县（市、区）。基于该数据库，本文构造了县域层面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变量。

表1 样本县（市、区）范围

年份	收录匹配 县（市、区） 数量（个）	占全国 县（市、区） 比例（%）	占东部地区 县（市、区） 比例（%）	占中部地区 县（市、区） 比例（%）	占西部地区 县（市、区） 比例（%）	占东北地区 县（市、区） 比例（%）
2008	2321	81	72.75	86.26	85.13	77.08
2009	2327	81	74.94	86.00	84.12	77.78
2010	2293	80	75.35	86.16	80.78	77.43
2011	2324	81	77.21	86.30	82.53	77.08
2012	2039	71	70.14	83.19	63.86	75.00
2013	2068	72	72.22	80.79	66.76	74.31
2014	2032	71	67.57	80.76	66.64	74.65
2015	1841	65	65.15	67.47	66.11	50.35
2016	1798	63	61.93	62.94	68.87	44.44

第三，《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实际年份为2008—2016年的数据，以及各地统计公报数据。本文利用这些数据构造了县域层面的相关变量。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参考宋华盛和卢历祺（2024）的方法，采用要素成本增加值的概念来测算。具体的衡量方式如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固定资产折旧），其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固定资产折旧”之和指代要素成本增加额，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指包括工资、奖金、保险、公积金以及其他津贴补助等金额。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均衡性转移支付。根据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以“县承接为主”的现实，本文以县域每年获取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来衡量。

3.机制变量。本文机制变量如下：①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采用县域人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支出度量。②工资折价率，采用工资折价率度量企业劳动力议价能力已得到众多文献支持，并且通过工资折价率可以更为直观地观察到劳动力议价能力。具体而言，工资折价率越高则表示劳动力议价能力越低，反之亦然。为此，本文参考 Yeh et al.（2022）的方法计算了企业层面的工资折价率。

③工资水平，以企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人均额度量。④劳动生产率，以企业人均要素成本增加额度量。⑤资本—劳动替代比例，以企业人均资本额度量。

4.控制变量。参考既有文献以及结合文章研究实际（魏下海等，2013；柏培文和杨志才，2019；唐盟，2023），本文从企业及县域层面选取了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营业收入、企业负债率、企业利润率、企业经营现金流、县域人口规模、县域产业结构、县域经济水平。此外，为了缓解异常值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双侧 5%缩尾处理。相关变量的定义描述见表 2^①。

表 2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要素成本增加额	0.265	0.191	0.017	0.760
核心解释变量	均衡性转移支付	县域人均均衡性转移支付(万元/人)	0.017	0.025	0	0.087
机制变量	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	县域人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支出（元/人）	910.122	4773.351	2.754	561022.6
	工资折价率	企业工资折价率	2.470	3.468	0.362	15.819
	工资水平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人均额（万元/人）	4.201	4.030	0.500	16.309
	劳动生产率	企业人均要素成本增加额(万元/人)	27.366	35.327	1.944	139.791
	资本—劳动替代比例	企业人均资本额（万元/人）	20.524	30.541	0.164	119.51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万元）	12862.78	23988.12	53.100	90067.12
	企业营业收入	企业营业收入（万元）	9330.756	15776.81	28.700	56768.99
	企业负债率	企业总负债/企业总资产	0.558	0.286	0.005	0.959
	企业利润率	企业净利润/企业总资产	0.018	0.068	-0.123	0.188
	企业经营现金流	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企业营业收入	0.062	0.281	-0.563	0.828
	县域人口规模	县域年末人口（万人）	66.636	34.518	21	144
	县域产业结构	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县域第三产业增加值	1.478	0.736	0.275	3.149
	县域经济水平	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2696668	2591202	392689.1	9936760

注：①表中各变量为原值。②为了减少异方差所带来的偏误，后文回归分析中对“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替代比例”“企业规模”“企业营业收入”“县域人口规模”“县域经济水平”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三）计量模型

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模型设计如下：

^①除上述主要变量外，本文实证分析中还使用了一组辅助变量，详细介绍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三。

$$lashare_{ict} = \alpha + \beta tpayment_{ct} + \gamma control + v_i + \sigma_t + \mu_{ict} \quad (13)$$

(13) 式中: i 表示企业, c 表示县域, t 表示年份。 $lashare_{ict}$ 表示被解释变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α 表示截距项; $tpayment_{ct}$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均衡性转移支付, β 代表其系数; $control$ 表示一组企业和县域控制变量, γ 代表该组控制变量的系数; v_i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 σ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μ_{ict} 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特征化事实

为了更好地回答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回归之前,本文借鉴陈斌开等(2018)的思路,利用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分别剔除固定效应之后的残差,绘制了分组散点图。图1直观地展示了均衡性转移支付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可知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初步说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可以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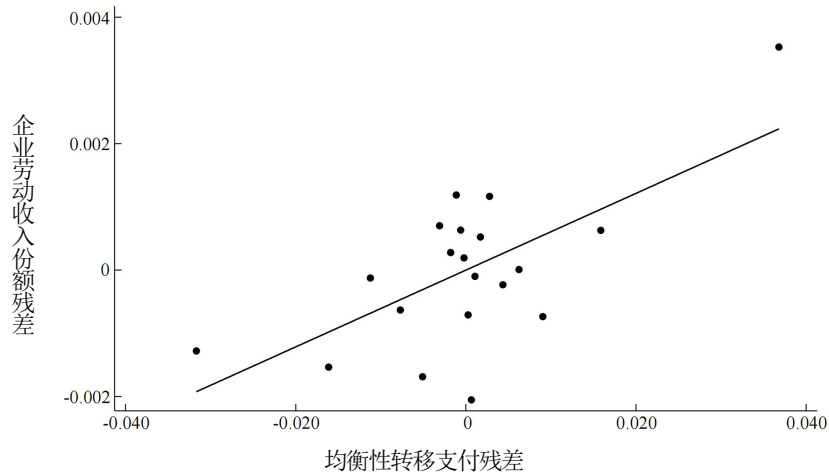


图1 均衡性转移支付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结果

(二) 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基准回归结果,本文主要关注核心解释变量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的显著性。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依次引入企业层面和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均衡性转移支付有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本文以(3)列为例进行经济意义分析,在2008—2016年的样本期内,均衡性转移支付大概可以促进0.001个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约占样本期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10%^①。

^①在2008—2016年的样本期间,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了约0.026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了约0.01倍。另外,0.001个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计算方法是 0.056×0.026 ,而其占比10%的计算方法是 $0.001/0.01$ 。

表3 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1)		(2)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均衡性转移支付	0.061***	0.009	0.052***	0.009	0.056***	0.009
企业规模			0.001	0.001	0.001	0.001
企业营业收入			-0.034***	0.000	-0.034***	0.000
企业负债率			-0.001	0.001	-0.001	0.001
企业利润率			-0.428***	0.004	-0.428***	0.004
企业经营现金流			-0.015***	0.001	-0.015***	0.001
县域人口规模					0.009***	0.002
县域产业结构					0.002***	0.001
县域经济水平					-0.004***	0.001
常数项	0.264***	0.000	0.604***	0.006	0.625***	0.022
企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971296		971296		971296	
R ²	0.741		0.764		0.764	

注：①***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如下^①。

1. 更换均衡性转移支付衡量方式。本文从结构角度更换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度量方式，具体以均衡性转移支付占县域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值来刻画。回归结果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依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重新估计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参考陆雪琴和田磊（2020）的方法，本文将企业生产税纳入要素成本增加值的方程，衡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外，本文也借鉴肖土盛等（2022）的思路，采用“全年工资及奖金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刻画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直接反映企业在经营收入中用于支付劳动报酬的比例，以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劳动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估计结果显示，均衡性转移支付依旧有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

3. 排除其他相关政策影响。既有研究发现，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出台、2012年“营改增”政策和2014年开始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本文的研究区间恰巧涵盖上述改革的时间，因此，本文采取双重差分模型中政策变量的“政策一年份”交乘项构造方式，依次刻画上述政策改革并全部纳入（13）式加以控制。回归结果表明，均衡

^①稳健性检验的详细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四。此外，更新数据的稳健性检验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五。

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剔除未获得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地区。本文进一步剔除了未获得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并未改变。

5.其他转移支付的竞争性解释。逻辑上,其他转移支付也可能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作用,从而与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产生替代或互补的竞争性效应。为排除竞争性效应,本文把专项转移支付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也纳入(13)式中加以控制。实证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具有稳健性。

6.交互固定效应模型。为排除不同行业 and 不同省份的宏观政策冲击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控制了行业 $\times$ 年份以及省份 $\times$ 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7.改变数据缩尾方式。本文采用1%双侧缩尾方式处理连续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仍稳健。

8.控制政府债务率。为排除政府债务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把县域政府债务率纳入回归方程。估计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并未改变。

9.考虑人口数据质量与资金使用效率。在前文中,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度量方式,可能忽略了人口数据的质量问题,如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差异。为排除人口数据质量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标准化度量影响,以及充分考虑县域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差异,本文采取了以下两种做法:一是采用县域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重新标准化度量均衡性转移支付,并且在回归方程中控制县域财政资金结余率以控制县域资金使用效率差异。二是删除样本本期统计户籍人口口径的年份数据(2008年),统一采用年末常住人口标准化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进行研究(2009—2016年),并且在回归中继续控制县域资金使用效率差异。估计结果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10.控制样本稳定性。根据前文表1可知,本文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样本在2015—2016年出现了下滑,并且分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考虑到中央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去向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因而遗漏的县域可能是财政困难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从而会低估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剔除了2015—2016年的样本,尽量控制研究样本的稳定性。回归结果表明,本文基准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但基准回归可能低估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

(四) 内生性问题

前文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促进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但这一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例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本质是一种收入分配关系的体现,均衡性转移支付也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高低情况,也许会影响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施策力度,从而可能产生反向因果问题。除此之外,尽管本文已控制企业自身特征及县域层面的绝大多数经济社会条件,但仍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因素。为尽可能地缓解内生性偏误,本文进一步利用工具变量法识别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本文参考Huang et al. (2020)的研究思路,构造了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定义如下:工具变量 z =县政府到省会城市的地理距离 $\times$ (2008—2016年各省均

衡性转移支付)。

工具变量 z 作为有效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在相关性方面。距离省会城市较远的县区，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通常面临更高的行政成本与交通成本。为保障此类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性，上级政府对下分配均衡性转移支付时往往会对这些地区给予适度倾斜，以弥补其地理位置的劣势。例如，历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均明确强调“运距系数”等地理指标在测算转移支付规模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某一年度实际获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额度，也会受到其所在省级政府当年获得资金总额的显著影响。因此，工具变量 z 所包含的“地理距离”“省级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两个构成要素，能够系统性地解释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分布特征，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其二，在外生性方面。县与省会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属于先天地理变量，具备天然的时间稳定性与不可操控性，不太可能受到研究期内（2008—2016年）企业用工行为或劳动收入结构变化的反向影响，因而具有良好的外生性。尽管该变量可能通过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间接作用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但本文已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关键变量，有效隔离了上述间接路径可能造成的干扰。此外，均衡性转移支付在制度设计上并非由企业个体因素所决定，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上级政府对财政能力薄弱县区的均衡性安排，这进一步增强了该工具变量的外生性。综上所述，该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识别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根据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①，本文发现，工具变量 z 与均衡性转移支付紧密相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且，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均衡性转移支付依然显著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

五、机制分析：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逻辑

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前文提到的基本机理与模型分析，对均衡性转移支付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的机制验证分为三步：第一步，检验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结构的影响，观察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是否由企业劳动要素收益变动所决定。第二步，结合上述发现，进行详细的作用路径检验，验证均衡性转移支付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路径。第三步，为深化分析，从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 and 不同所有制企业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结构变化分析

根据前文估算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式，本文将企业要素收益份额拆解为工资收入份额、社保收入份额、营业盈余份额、固定资产折旧份额。然后分别对均衡性转移支付进行回归，观察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要素收入份额构成的相对影响。基于表4（1）列、（2）列，可以发现，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框架内，均衡性转移支付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工资收入份额，也改善了企业社保收入份额。这说明企业劳动要素收益在增长。根据表4（3）列、（4）列的回归结果则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营业盈余份额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明显降低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份额，这表明资本收益转化率在

^①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六。

下降。综合表4的估计结果可知,企业劳动要素收益水平出现了相对上升,资本要素收益水平发生了相对下降。换句话说,均衡性转移支付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主要在于提升劳动要素收益水平。

表4 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工资收入份额	社保收入份额	营业盈余份额	固定资产折旧份额
均衡性转移支付	0.095*** (0.010)	0.013*** (0.002)	0.016 (0.010)	-0.069*** (0.010)
常数项	0.521*** (0.022)	-0.016*** (0.005)	-0.416*** (0.026)	0.721*** (0.02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906848	765353	929464	929464
R ²	0.733	0.710	0.830	0.861

注:①***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与表3基准回归相同。

(二) 作用路径分析

表5报告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结果。可知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提升了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

表5 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	
	系数	标准误
均衡性转移支付	8.292***	0.666
常数项	10.563***	0.72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观测值数	9549	
R ²	0.602	

注:①***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聚类到县域层面。③控制变量与表3基准回归中县域层面控制变量相同。

表6报告了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路径的回归结果。其中:(1)列汇报了以工资折价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的工资折价率明显下降,即劳动力议价能力显著提高。(2)列、(3)列则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明显提高了企业工资水平和企业劳动生产率;而且,(2)列的估计系数大于(3)列,说明相对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言,企业的工资水平增长更快。根据(4)列可知,均衡性转移支付×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对资本—劳动替代比例的影响不显著,说明该渠道的作用效应不明

显。总体来看，命题1得到验证^①。

此外，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其一，员工工资提升，而员工人数不变或下降；其二，员工工资不变，而员工人数增加。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劳动力雇用情况变化。根据表6（5）列，本文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对企业的劳动力雇用存在显著为负的影响，这意味着企业劳动力雇用减少了。同时也表明此类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是一种工资提高但劳动力雇用下降的增长结构。

表6 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路径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工资折价率	(2) 工资水平	(3) 劳动生产率	(4) 资本—劳动替代比例	(5) 劳动力雇用
均衡性转移支付×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	-1.244*** (0.172)	0.284*** (0.033)	0.179*** (0.032)	-0.063 (0.047)	-0.367*** (0.028)
均衡性转移支付	5.847*** (1.203)	-1.615*** (0.232)	-1.207*** (0.221)	0.530* (0.322)	2.196*** (0.193)
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	0.061*** (0.006)	-0.025*** (0.001)	-0.029*** (0.001)	-0.001 (0.002)	0.044*** (0.001)
常数项	-0.321 (0.801)	3.294*** (0.147)	3.584*** (0.165)	1.773*** (0.205)	0.779*** (0.13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342414	342392	338465	341296	342392
R ²	0.675	0.805	0.894	0.901	0.957

注：①***和*分别代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与表3基准回归相同。

（三）异质性分析

1.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本文观察了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变化情况。总体而言，尽管均衡性转移支付均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其影响路径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存在部分差异^②。

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提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显著降低了工资折价率，并推动了工资水平及劳动生产率上升，但没有显著影响资本—劳动替代比例。与此同时，工资成本上升也使企业在用工决策上趋于谨慎，导致劳动力雇用数量显著下降。总体来看，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也形成了“工资上涨—用工收缩”的结构性权衡。

^①因篇幅所限，要素弹性检验结果未在文中报告，详细的结果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查看本文附录七。

^②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八。

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同样促使工资折价率下降、工资水平提升，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提升幅度均低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资本也没有明显替代劳动。但是，在工资增速较快而劳动生产率提升较弱的背景下，企业难以通过产出对冲用人成本压力，因而表现出劳动力雇用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不过，由于该行业本就对劳动力依赖较弱，故雇用调整的幅度小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2.不同所有制企业。进一步地，本文还考虑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异。结果显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均衡性转移支付均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工资折价率下降、工资水平上升、劳动生产率提升、资本—劳动替代比例不明显等路径产生影响。此外，企业的劳动力雇用规模也都显著缩减了。然而，两类企业之间的受影响情况仍具有一些差异性^①。

在国有企业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伴随更显著的工资折价率下降和工资水平提升，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表明国有企业在劳动力议价过程中对政策驱动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改善反应更为敏感。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国有企业在政策落实中具有“响应优先”的制度特征，在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影响下，更倾向于提升劳动力待遇；二是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国企可能通过“提质减量”优化人力结构，即劳动生产率提升与劳动力雇用下降并存。

相较之下，民营企业虽也呈现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与工资水平改善的趋势，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相对有限。这表明，尽管民营企业也受益于劳动力质量提升，但可能在政策红利的吸收与转化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约束。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民营企业在成本控制与用工弹性方面更为敏感，更容易通过裁员或抑制新增用工应对工资上升压力；另一方面，部分中小型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本转化方面能力有限，难以有效利用人力资本改善实现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导致政策效果在效率维度上存在相对边际递减。

六、进一步讨论：在“促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中兼顾“稳就业”

前文分析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促进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但由于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提升，企业减少了劳动力要素投入，表现为企业劳动力雇用下降。因此，除了继续强化劳动力技能培训等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内生政策外，再引入其他外部政策，从而平衡或兼顾就业稳定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值得进一步探索。在该部分，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这一外部政策的影响。逻辑上，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直接为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有助于缓解议价工资增长带来的流动性约束，从而有利于企业对劳动力要素投资。因此，如果政府提高对企业的财政补贴，至少可以观察到：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增长，同时劳动力雇用不再下降。为了揭示上述效应，本文构建了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以及与财政补贴的交乘项，并把交乘项分别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和劳动力雇用回归。

根据表7可以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财政补贴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均衡性转移支付×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财政补贴对劳动

^①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九。

力雇用的影响不再显著为负。这表明，政府对企业实施财政补贴后，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改善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不仅可以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而且能够延缓企业劳动力雇用下降，从而实现“促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兼顾“稳就业”的政策效果。

表 7 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进一步讨论的回归结果

变量	劳动力雇用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均衡性转移支付×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财政补贴	-0.012	0.008	0.005**	0.002
常数项	0.771***	0.139	0.680***	0.03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342392		342414	
R ²	0.957		0.780	

注：①***和**分别代表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差聚类到企业层面。③控制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财政补贴、均衡性转移支付×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等变量。④其余控制变量与表 3 基准回归相同。

七、结论与启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通过完善税收、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机制，增强财政再分配的调节功能。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部署，以更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持居民收入增长，助力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居民增收的基础，而均衡性转移支付是财政政策的关键抓手。揭示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将直接回应如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提高居民劳动报酬、促进收入合理分配、扩大内需的现实问题，对当前实施更加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就业和居民增收，具有现实价值。长远来看，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对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构建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逻辑分析框架，提出待检验理论命题，进而基于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全国税收调查匹配数据，剖析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和逻辑机理。

本文研究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显著降低了工资折价率，还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终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此外，由于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提升，企业会减少劳动力雇用。基于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 and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效应不会因行业或企业类型而存在差异，同时，企业劳动力雇用下降的现象在各类行业和企业中均普遍存在。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在政府对企业实施财政补贴后，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改善就业和提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不仅增加了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同时也可以延缓企业劳动力雇用下降，从而实现“促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兼顾“稳就业”的政策效果。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具有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遵循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优化的政策理念，着重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本文研究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释放了初次收入分配的调节成果。因此，本文认为，需要继续遵循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优化的政策理念，着重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一方面，可以在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配置中，适度提升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占比。另一方面，要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在“以县承接为主”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下，强化“财力下沉+绩效挂钩”机制，对财政困难县加大倾斜力度，缓解基层“三保”压力，夯实共同富裕的基层治理基础。

第二，构建“提份额”与“稳就业”协同政策体系，优化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初次分配效能。一直以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与“稳就业”两者兼具重要性。劳动收入份额是初次分配公平性的核心指标，提高劳动报酬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而稳就业居于“六稳”“六保”的首位。本文研究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虽能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但可能因工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导致企业缩减用工规模。对此，需多措并举实现“提份额”与“稳就业”双赢。首先，以均衡性转移支付强化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财力保障。在此基础上，继续丰富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内容：一是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劳动力技能素质。二是优化劳动就业保护体系，建立以职业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合同签订制度，合理提高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保护劳动力就业和收入权益。三是建立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挂钩机制，保障工资的合理增长。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均衡性转移支付与积极就业政策的协同。例如，通过有效利用财政补贴和就业补助等相关就业激励政策，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稳定就业。

第三，推进均衡性转移支付提质增效，突出居民增收导向，强化基本民生保障能力。首先，资金分配上，优化因素法指标体系，把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居民收入分配改善等因素挂钩，应更加明确将促进劳动报酬增长作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的奖励系数因素。其次，预算执行上，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例如，加大支持居民增收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最后，绩效评价上，把劳动报酬提升等居民增收指标纳入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定期公开资金使用效果排名，强化绩效目标监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本文揭示了均衡性转移支付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作用，并为深入理解上述核心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①在此政策指引下，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之一。因此，如何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也是一项值得不断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从财政转移支付视角来看，均衡性转移支付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能否有效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通过何种路径来实现这一目标，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柏培文、杨志才，2019：《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管理世界》第5期，第78-91页。
2. 蔡昉、王美艳，2014：《中国面对的收入差距现实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第2-7页。
3. 陈斌开、黄少安、欧阳涤非，2018：《房地产价格上涨能推动经济增长吗？》，《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1079-1102页。
4. 陈凌庆、刘蓉、邓兴华，2025：《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税收归宿研究——基于资本劳动要素视角》，《经济学动态》第1期，第78-93页。
5. 杜鹏程、王姝勋、徐舒，2021：《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的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第105-118页。
6. 范燕丽、丛树海，2024：《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户生计韧性：“驱动”还是“制约”》，《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第125-148页。
7. 方红生、许铭雪、赵乐新，2024：《集权式财政改革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基于“乡财县管”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财政研究》第5期，第85-98页。
8. 伏润民、缪小林、张彰、赵一心，2024：《共同富裕目标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改革：基于广义国民收入的分析》，《经济研究》第1期，第36-52页。
9. 伏润民、王卫昆、常斌、缪小林，2012：《我国规范的省对县（市）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研究》，《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39-62页。
10. 郭凯明，2025：《从生产网络变迁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97-118页。
11. 韩一多、付文林，2019：《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基于转移支付依赖的门槛效应分析》，《财贸经济》第6期，第40-54页。
12. 何小钢、朱国悦、冯大威，2023：《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第98-116页。
13. 李实、朱梦冰，2022：《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管理世界》第1期，第52-61页。
14. 刘亚琳、申广军、姚洋，2022：《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新变化与再考察》，《经济学（季刊）》第5期，第1467-1488页。
15. 陆雪琴、田磊，2020：《企业规模分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世界经济》第9期，第27-48页。
16. 马光荣、孟源祎，2022：《财政转移支付的资本化与福利分化效应》，《经济研究》第9期，第65-81页。
17. 缪小林、张蓉，2022：《从分配迈向治理——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管理世界》第2期，第129-149页。

- 18.宋华盛、卢历祺, 2024: 《大数据发展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经济学动态》第1期, 第111-128页。
- 19.唐盟, 2023: 《政府间专项转移支付、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6期, 第27-41页。
- 20.万广华、江葳蕤、赵梦雪, 2022: 《城镇化的共同富裕效应》, 《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第2-22页。
- 21.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 2013: 《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第8期, 第16-28页。
- 22.肖土盛、孙瑞琦、袁淳、孙健, 2022: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与劳动收入份额》, 《管理世界》第12期, 第220-237页。
- 23.谢申祥、陆毅、蔡熙乾, 2019: 《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第40-59页。
- 24.姚加权、张锬澎、郭李鹏、冯绪, 2024: 《人工智能如何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基于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的视角》, 《管理世界》第2期, 第101-116页。
- 25.张俊森、余琪、周康, 2025: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微观视角剖析》, 《经济学(季刊)》第1期, 第242-259页。
- 26.张松林, 2015: 《城市化过程中市场化对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44-57页。
- 27.张同斌、刘文龙、付婷婷, 2023: 《〈社会保险法〉实施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第91-112页。
- 28.张子尧、黄炜、丁相元、尹恒, 2023: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世界经济》第12期, 第167-196页。
- 29.周强, 2021: 《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与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第38-59页。
- 30.周强、李阳、罗楚亮, 2024: 《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率及共同富裕效应》, 《经济研究》第9期, 第173-189页。
- 31.Aronsson, T., and S. Blomquist, 2008, “Redistribution and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an Economic Fede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10(1): 125-143.
- 32.Autor, D. H., W. R. Kerr, and A. D. Kugler, 2007, “Does Employment Protection Reduce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US States”, *Economic Journal*, 117(521): 189-217.
- 33.Blanchard, O., and F. Giavazzi, 2003,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in Goods and Labor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3): 879-907.
- 34.Huang, Y., M. Pagano, and U. Panizza, 2020, “Local Crowding-Out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e*, 75(6): 2855-2898.
- 35.Li, B., C. Liu, and S. T. Sun, 2021, “Do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Decrease Labor Shar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0: 102624.
- 36.Sala, H., and J. I. Silva, 2013, “Labor Productivity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Evidence from Europe”,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Vol. 40: 31-41.
- 37.Yeh, C., C. Macaluso, and B. Hershbein, 2022, “Monopsony in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7): 2099-2138.

The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China's Equalization Transf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Enterprise Labor Income Share

WANG Kebin^{1,4} HOU Jianxiang^{2,4} ZHANG Zhibin³ HOU Yongkang⁴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University)

Summary: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fundamentally about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essential to increase the share of labor compensation in primar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trengthen the redistributive role of tax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fiscal transfer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on labor income share adjustments through taxation or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have yielded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These divergent findings highlight the critical yet understudied role of fiscal transfers in addressing this issue.

This paper uses matched data from county-level equalization transfers and the National Tax Survey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equalization transfers on enterprises' labor income share through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public services chann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qualization transf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enterprises' labor income shar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equalization transfers expand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public services, thereby reducing the wage discount rate and enhancing labor productivity, which boosts the labor income share. As wages rise faster than productivity, firms tend to reduce labor hiring.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se patterns persist across industries with different factor intensities and ownership types, indicating that increases in labor income share and declines in employment are pervasive. Moreover,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enterprises, equalization transfers not only further rai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through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but also slow the decline in employment, thereby achieving both "increase i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and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to relevant literature. First, it offers a novel perspective by focusing on equalization transfers, thereby expanding research on fiscal redistribution's role in shaping labor income share. Second,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s by connecting equalization transfers to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yielding micro-level evidence of how fiscal tools can reshape primary distribution while offering policymakers a new instrument for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rd, it demonstrates data innov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county-level transfer data (2008–2016), advancing the study of subnational fiscal policy effects and enriching literature on provincial-local fiscal systems with updated empirical insights.

Keywords: Equalization Transfers; Labor Income Share; Income Distribution; Common Prosperity; Financial System

JEL Classification: H77; O15

(责任编辑: 小林)